

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上）

慈容

《普門學報》發行人

前言

時代的進步，人類文明的發展，一部分源自於「物競天擇」之自然定律使然，另一方面則有賴於人爲的創造、改革。

自古以來，每個時代都有許多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本著犧牲奉獻的精神，對國家社會做出許多的革新，才使得人類從蠻荒到文明，由專制到民主。

在佛教史上，歷代許多高僧大德們，不但深體佛陀本懷，崇佛奉法；尤其勇於革新，才使得佛教能在每個時代適應社會的需要，進而發揮佛教覺世牖民的教化之功。

談到佛教的改革大師，當首推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他不但是向自己革命，他一生所開示的教法，也都是指導眾生如何革除自己的陋習；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革命並非消極的破壞，而是具有積極性的建設。

現在有很多人不了解佛教，以爲今日學佛的人是逃避現實，是消極厭世，這實在是誤解了學佛的本義。佛陀所以出家修道成佛，一方面當然是爲了解救自己生死苦惱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是爲了救濟被壓迫的人民。我們如果深入了解釋迦牟尼佛住世奮鬥的經過，一定就會明白他實在是一位偉大而慈悲的革命者。

佛陀革命的對象：一是階級森嚴的印度社會，二是沒有究竟真理的神權宗教，三是生死循環不已的自私小我。

一般的革命家，雖然標榜著爲民的口號，但人民並不因此而得到幸福，因爲他們的革命是基於瞋恨敵人，所以用出的革命手段都很殘忍。唯有佛陀的革命，完全是由於慈悲心腸的激發，他的革命是用慈悲覆護一切，感化一切，他不用暴力，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大都是由下而上的。因為他感到自身的不自由、不安樂，而才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所以就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唯有佛教的教主佛陀，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他本是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他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很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與正義，他不能不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可憐的人們打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而沒有向內革命，明白說就是向別人革命而沒有向自己革命。唯有佛教的教主佛陀，他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自私的小我，都有生死之源的煩惱無明，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他不得不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他捨離一切的愛染，去過平實的生活，這才是究竟的革命。

所以，講到革命問題，世界上偉大的革命者其數雖多，但那些革命與佛教的革命精神相比，實有天地的懸殊。

本文的主旨，即希望透過古今高僧大德，舉凡在弘揚教義、改革教制、從事社會教化有建樹者，以他們的行誼做為今日佛子學習的榜樣，希望大家奮起，勇於改革，不革新則佛教無以進步。

壹、古代的改革創見大師

如前所述，歷代因為迭有目光高遠的創見大師為佛教做出許多的改革，使佛教能在當代大放異彩，甚至歷經時代變遷及各種法難的摧殘，至今依然屹立不搖。其中較具代表性與影響力者，民國以前諸如道安大師的力斥「格義佛教」、開創「佛典目錄」先河、「統一釋姓」，並且主張「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慧遠大師首於山林「聚眾講學」，並作〈沙門不敬王者論〉；道生大師力持「一闡提也有佛性」，主張人人皆得成佛；以及智者大師提出「五時八教」之教判、信行大師創「三階教」、玄奘大師另創「譯經體例」、惠能大師「傳法不傳衣」、神會大師「為南宗定位」、馬祖大師「創叢林」、百丈禪師「立清規」、永明禪師大力「調和禪淨」等，都帶領佛教安然走過每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茲略述如下：

一、道安大師力斥「格義佛教」

佛教東傳中國之初，為了適應傳統的思考模式，許多法師在講述佛理時，大都引用中國人熟悉的語彙，特別是以老莊術語來說明佛教的般若空義，此稱為「格義」佛教。

道安大師（三一二—三八五）生當東晉我國初期佛教急遽發展時期，也正是格義佛教蓬勃發展的時代。初時道安大師也致力於「以格義弘揚佛教」，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

佛教，不免有其侷限，且容易誤解教義，因此在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大師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大師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轉譯的素質參差不齊，甚至出現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道安大師有感於此，乃廣搜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收錄了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建立了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

道安大師以前，中土的沙門都是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大師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道安大師對於佛教的具體貢獻包括：組織僧侶，科制佛經，制定戒規，以釋為姓，整理佛典，主持譯經，編纂經錄，綜攝佛法等。其中任舉一項，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於道安的努力，將中國佛教素樸、草創的時期作一總結，而確定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因此，稱道安大師為中國佛教的奠基者，誠非過譽之辭。

二、慧遠大師首開「聚眾講學」之風

佛教與政治，都是管理眾人的事，彼此息息相關。兩者之間的關係，證諸歷史，佛教愈弘揚的時代，國運就愈昌隆；反之，國家富強，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因此東晉道安大師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然而道安大師的高足慧遠大師（三三四—四一六）卻著述〈沙門不敬王者論〉，強調佛教應該超然於世俗之外，立論雖然與師背道而馳，實際上是有其時代背景使然。

在東晉時代，由於太尉桓玄壓迫佛教，車騎將軍庾冰主張佛教沙門應對王者禮敬。安帝之際，桓玄支持庾冰之論，認為佛教教團應該從屬於國家權力之下。慧遠大師本著佛教徒之立場，主張沙門不必禮拜帝王，於是著書論述佛教出家之本質，將出家人乃方外之屬，不宜禮敬王者的觀點，深入列點分析。此後，出家人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得到明確的界定，僧眾在寺院中的清修也獲得保障，對於提昇佛教徒於當時乃至後世的社會地位，都是功不可沒。

慧遠大師生逢東晉戰亂時期，在道安大師「分張徒眾」時被派往南方，後留住廬山，建立僧團，率眾修行，並於元興元年（四〇二）與劉遺民、雷宗次、周續之、張季碩等百餘同道創立白蓮社，專以淨土念佛為修行法門，共期往生西方淨土，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其結社念佛，提倡彌陀淨土的信仰，不但接引知識份子學佛，把佛法傳入民間，尤其開創了「聚眾講學」的先河。

慧遠大師提倡的彌陀淨土信仰，是植基於「神不滅論」的基礎上，並且依據此理論提出「三報論」，即現報、生報、後報。此論說明了業報的複雜性，相較於中國傳統的報應說只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有了更深層的發揮。

此外，慧遠大師發揮道安大師的「本無論」，提出「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法性論》）。他以「法性」為萬法之本，大力闡發道安大師的性空思想，深化了當時的般若學。此與「沙門不敬王者論」及「三報論」，都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種首創，而且對後世發揮極大的影響。慧遠大師可謂居功厥偉。

三、道生大師力持「闡提成佛」之說

佛陀成道時，曾發出宣言：「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佛性。」既然眾生本具佛性，那麼斷絕善根的「一闡提」能否成佛呢？

這個問題在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四一八），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當時法顯大師於建康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經文言及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唯「一闡提」除外。這種論點受到當時一般守舊派學者的一致認同，咸認「闡提不能成佛」。唯獨道生大師（三五五—四三四）不受經文束縛，他大膽剖析經理，洞入幽微，發揮自己的見解，以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自不應獨排同屬眾生的一闡提人，因此在宋文帝元嘉五年（四二八）提出一闡提人也有佛性，亦得成佛的主張。

道生大師這種思想在北涼曇無讖所譯《大般涅槃經》中有所記載，但當時尚未傳入南方，因此他的獨到創見被指摘為邪說惑眾，違背佛經原旨，在大眾激憤難平下，被逐出僧團。

陷入孤立的道生大師，雖被視為離經叛道，他仍堅守自己的理念，面色凜然而莊重地立誓：「若我所言不合經義，願於現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獅子座。」言罷即拂袖而去。

黯然離開建康後的道生大師，曾在江蘇虎丘山聚石為徒，闡述「闡提成佛」之說，感得群石點頭，後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美談。

道生大師不拘泥於經論的言教文句，不受當時舊說的束縛，敢於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主張「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直到宋武帝永初二年，曇無謙於涼州譯出《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經中明白指出「闡提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這時大家才一致歎服道生大師的卓越見識與造詣之深。

道生大師後來回到首都建康，備受南朝宋武帝禮遇。一日，武帝宴請眾僧，因故耽誤用齋時間，當時眾人懷疑已過午時，不敢舉箸動食。宋武帝連忙表明午時未過，但眾人面面相覷，依然不敢輕舉妄動。此時，道生大師從容表示：「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並率先取食，於是眾人不再猶疑，隨道生大師用餐。

過午不食，乃印度佛教傳來的習俗，但道生大師能通權達變，臨機巧用，化解尷尬的場面，眾人莫不讚歎他樞機得衷。

道生大師是晉末宋初佛教史上特出的思想家，他上承「般若」，下開「涅槃」，倡導「佛性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頓悟成佛」之旨，使得禪宗「頓悟說」成為眾多流派之主流，進而影響宋明理學達數百年之久，乃中國佛教史上開一代風氣之大師。

四、智者大師創立「五時八教」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陀說法，旨在「示教利喜」，但因佛陀說法的時地因緣，以及對象根機有異，為了觀機逗教，所說的佛法義理雖然有深有淺，但都不離佛陀的本懷。

然而三藏十二部經典流傳到後世，佛弟子們因為各人根機不同、喜好不同、研究的法門也有所不同，因此產生各種宗派；各個宗派之間又競相依自己的立場來判定佛陀所說教法的價值與解釋其相狀差別，稱為「教相判釋」，又稱「教判」或「判教」。例如「一音教」、「頓漸二教」、「三時教」、「五教判」等，當中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最負盛名。

「五時八教」是智者大師（五三八—五七九）根據佛陀說法的順序，分為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五時」；從教導眾生之形式方法分為頓、漸、祕密、不定等四種類，稱為「化儀四教」；又依適應眾生根機而教導之教理內容，分為藏、通、別、圓等四種類，稱為「化法四教」，以上總稱為「五時八教」。

智者大師素有「小釋迦」的尊號，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五三八），一生力弘法華精神及龍樹教學，並以中國獨特的形式加以體系化。他所提出的「五時八教」，綜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經典內容，在判釋經教上被視為最具代表性，而奠定天台宗教觀基礎。

此外，智者大師修正南方「輕禪重講」與北方「輕講重禪」的弊病，倡導「教觀雙運」、「解行並進」的教學，獨創依禪觀而修行的止觀法門，消溶中國幾百年來南北方佛教的偏頗。由於他博識善辯，深達禪觀，陳、隋兩朝都對他相當尊重，陳宣帝甚且敬稱他為「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

五、信行大師創設「三階教」

在佛教裡，依佛陀教法弘傳的情形，可分為正法、像法、末法三個時期；亦即：如來滅後，教法住世，依教法修行，即能證果，稱為正法；雖有教法及修行者，多不能證果，稱為像法；教法垂世，人雖有稟教，而不能修行證果，稱為末法。

隋代的信行法師（五四〇—五九四），有鑑於隋代已進入末法時期，因此主張必須修行「普法」，始易有成。他根據時、處、機（人）三項，將佛教分成三階，創立「三階教」，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教派。

信行法師創立「三階教」的信念，是秉持「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之慈悲救世的大乘菩薩情懷。他極力宣揚大乘利他精神，親執各種勞役，供養悲敬二田；他反對偶像崇拜而僅禮拜佛塔；他仿效《法華經》的常不輕菩薩，道路遇人，無論男女皆禮拜之，名為「普敬」。因其行持嚴峻，躍出時流，因此遠近僧俗俱來請益，門徒漸增。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信行大師在相州光嚴寺發願為皇帝、諸師、父母乃至一切眾生，施捨身命財物，建立禮佛、轉經、眾僧、眾生、離惡、頭陀、飲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燈燭、鐘唄、香、柴炭、洗浴等十六種「無盡藏行」，勸化信徒布施錢糧，由寺院庫藏統籌運用，供作修繕寺塔經藏或救濟、借貸貧苦百姓之用。

「無盡藏」實際上是一種普利大眾的財政組織，亦為根據布施波羅蜜所衍伸的福田思想。不久，一般寺院紛紛仿效，成立寺庫，藉以成為寺院經濟主要財源，當時第一名利化度寺即因信徒爭相布施，而成為天下聞名的佛教財務中心。此一濟貧撫孤的「無盡藏」制度，也為後世佛教財政組織及慈善事業樹立典範。

六、玄奘大師創新「佛教譯經」

佛教源於印度，卻在中國大放異彩，主要得力於經典的漢譯，才使得佛教在中國開花結果，璀璨耀世。

根據高僧傳記載，歷代留名譯經篇的高僧有百餘人，其中以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玄奘（六〇二—六六四）、義淨（六三五—七一三）、真諦（四九九—五六九）四人為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家。

鳩摩羅什譯經以「達意」為原則，主張依義不依文，他的譯筆流利，句偈清潤，帶動佛法通俗化、文學化，對佛教、社會貢獻卓著。玄奘大師則開創另一體裁的翻譯，他以「忠於原典」為要，並主張「五種不翻」，後世學者以玄奘為界，稱玄奘大師以前所譯之經典為「舊譯」，玄奘以後為「新譯」。

玄奘大師，洛陽緱氏縣（河南偃師）人，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六〇二），隋煬帝大業十年（六一四），年方十三歲即被破格以沙彌身分錄入僧籍，提取法名玄奘。

出家後的玄奘大師，遍訪名山耆宿，卻發現各處教法異說紛紜，尤其諸漢譯佛典的義理解釋不一，令人莫知所從，於是發大宏願，決心親至西方取經，追源考證梵文原典以解眾惑。

貞觀三年（六二九），由長安偷渡出關，前往西域。沿途沙河阻隔、鬼魔風暴，他抱著「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的決心，走過八百里流沙，終於抵達高昌國；之後於貞觀五年抵達摩竭陀國，留學當時印度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參禮戒賢論師，前後共五年。

其後，遍遊五印度，歷謁名賢，叩詢請益，尋求梵本，寫下《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載西域、印度、錫蘭等一百三十八國的歷史、地理、宗教、神話傳說、風土人情等。此書被譽為最早的地理名著，對於研究佛教史與古代西域、印度、中亞、南亞之史地、文化，乃至中西交通史，富有極高的價值，直至今日，仍為治印度史地學者之寶典，為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一部鉅著。尤其印度十大古蹟埋藏地底多年後，終因《大唐西域記》而得以重現人間，為此尼赫魯總理曾經親對星雲大師說：印度世稱文明古國，若無佛教，印度又有什麼值得向世人展現的呢？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玄奘意欲東返。戒日王及各國國王挽留不得後，於曲女城為玄奘舉行無遮辯論法會，五印度十八國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羅門等七千餘人到會，此即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辯論大會」。

次年，玄奘大師正式辭王東歸，取道今日新疆省南路、于闐、樓蘭等地，於貞觀十九年正月返抵長安，結束十七年歷經五萬餘里的西行之旅，共請回佛經梵文原典五二〇夾、六五七部。回國之日，唐太宗敕命梁國公房玄齡等率文武百官迎接，各地夾道歡迎，舉國歡騰。

玄奘大師深為太宗、高宗所欽重，曾與唐太宗三次出巡，太宗並曾經兩度勸他棄道輔政，玄奘均以「願守戒緇門，闡揚遺法」而固辭。太宗尊重其志，助其譯經工作，建長安譯經院詔譯佛經。玄奘先後於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譯經，十九年中主要譯出《大般若經》六

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毘婆沙論》二百卷、《俱舍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等，共計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總數遠勝羅什、真諦、不空諸大師所譯卷數總和。

玄奘大師集我國最偉大之佛學家、譯經家、外交家、地理學家於一身，是中國人的光榮，是求道者的示範，是青年奮鬥的楷模，是佛弟子學習的中心，更是第一個把中華文化宣揚到海外的使者，也為我國歷史寫下輝煌的一頁。

七、惠能大師「傳法不傳衣」

「衣鉢相傳」，鉢和法衣（袈裟）是佛教傳法的信物。佛教自印度佛陀時代，以至中國古代祖師，均有傳承法衣的傳統，也就是在門下選出優秀的弟子，而將教法傳之，為表徵記，亦授與僧衣，因而又稱這種僧衣或袈裟為信衣。

禪宗尤其特別重視傳法，通常以傳授袈裟作為正法傳授的象徵。此種傳承溯自靈山會上佛陀將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之後西天二十八祖，一直到中國六祖，都是衣鉢相傳。然而到了唐朝咸亨二年（六七一），五祖弘忍（六〇二—六七五）授記惠能為禪宗第六代祖師時，特別囑咐惠能，此後不必再傳衣鉢，因此在六祖惠能大師（六三八—七一三）臨入涅槃時，弟子法海問：「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六祖大師說：「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

六祖大師為甚麼不傳衣鉢給弟子？其原因有三：

第一、「衣鉢」是紛爭之端，因為傳「衣」、傳「鉢」就會造成門徒弟子之間的紛爭；每一個人都自不量力，總覺得自己的修行很高、很好，自己應該要得到「法」、得到「衣鉢」。六祖大師想到「衣鉢是爭端」，因此不傳。

第二、六祖大師根據達摩祖師的本意：「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六祖大師實踐達摩祖師的偈語，因此決定以「法」印證，而不傳「衣鉢」。

第三、所謂衣鉢相傳，傳衣鉢，只傳一個人；如果不傳衣鉢而傳法，則一個人可以得法，二個人也可以得法，乃至一百個人都可以得法。也就是說，假如不傳衣鉢，會有更多的人得到傳法印心，所以，六祖大師說：「我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稱為《法寶壇經》。如果你們能珍重守護，遞相傳授的話，這就叫做『傳法』。」

後來，六祖大師準備回新州入滅之際，又有門徒們向六祖大師請問：「大師既曰不傳衣，只傳法，法當傳付何人呢？」

六祖大師說：「法已付給大家，不須再問。我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惑亂，擾亂我的宗旨，屆時會有人不惜生命，出來替佛教釐清是非，樹立宗旨，那就是我現在只傳正法，衣不復傳的原因。」

果然，後來六祖大師的弟子神會禪師，在滑臺無遮大會中，高樹法幢，大作獅子吼，為六祖定位，使得六祖大師功垂中國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照耀古今。可見五祖弘忍大師與六祖惠能大師的「傳法不傳衣」，實乃睿智卓見。

八、神會大師「為南宗定位」

禪宗自西天二十八祖達摩東渡來華，衣鉢傳法，歷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門下又分南宗與北宗。

南宗以六祖惠能大師為中心，北宗以神秀大師做代表。南宗、北宗一向紛爭，如同兄弟鬩牆，因為彼此對於修行的方法，認知不盡相同。惠能大師認為心性本淨，本來是佛，識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故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神秀則認為佛性人人本具，但為客塵所覆，故須透過時時修習，拂塵除垢，才能成佛，因此有「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之偈。

南宗的禪重在頓悟，北宗的禪主張漸修，頓漸一直紛爭不已，惠能、神秀的門徒也勢如冤家，各護其主，一直認為自己一方才是得自五祖法脈的正統。

其實，頓、漸的分歧主要就是六祖和神秀兩位大師，他們對戒、定、慧這個根本佛法有不同的看法。神秀大師以「七佛通偈」來解釋戒、定、慧，他說：「諸惡莫作名為戒，眾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神秀大師對於戒、定、慧的這種解釋，可以明顯看出是一種對待法，他要人不做惡事，而要行善。這種法門，是接大乘人，同時也可以勸小根智的人。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對於真正的佛法不容易深入的話，很簡單的告訴他：「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就是戒、定、慧。

六祖惠能大師對於戒、定、慧的解釋是：「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惠能大師講的是心地法門，只要心地無非、無癡、無亂，那就是戒、定、慧，還要另外再找甚麼戒、定、慧呢？還有甚麼另外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呢？所以這一種道理是接最上乘人，是勸大根大智的人，是頓悟的法門。

神秀和惠能大師的法統之爭，到了六祖大師的弟子荷澤神會禪師（六六八一七六〇）時，達到最高峰。神會禪師一生的主要願望，就是要打倒北宗的神秀禪師，要立南宗惠能大師的禪門為正統的地位。因此，神會禪師一再大聲疾呼：「唯有曹溪的宗旨，唯有六祖惠能大師

才是禪門的嫡傳。」北方的普寂禪師，也和神秀大師一樣，受到朝野的敬重，被尊為國師。他推立神秀大師為六祖，視自己為七祖，所以也挺身而出，斥責荷澤神會禪師，同時也高聲疾呼：「惠能不是達摩的正統。」

後來神會禪師在滑臺的大雲寺開了一個無遮大會，他要立南宗為正統。他開滑臺大會的主要目的有三：

第一、攻擊北宗神秀大師的法統非正統，不是五祖弘忍大師的嫡傳。他要大家認識，只有惠能大師才是真正的法統。

第二、攻擊北宗漸修的法門。他認為漸修是一種方便，禪是頓悟的法門，唯有六祖大師所講的禪，才是禪的正統。

第三、在歷史上，所謂「南能北秀」：南宗惠能大師主「頓悟」，北宗神秀大師主「漸悟」。神會禪師就是希望透過滑臺大會，把頓漸的差別，讓大家分別、認清。

神會禪師為了擁護六祖的頓門成為禪宗的正統，一生奮鬥不懈。後來六祖惠能大師的法脈經過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兩位弟子的弘傳，開演出「五家七宗」的輝煌局面，使得南宗頓教的「一花五葉」，燦爛繽紛，光耀後世，從此禪的芬芳永傳人間。

九、馬祖大師「創叢林」、百丈禪師「立清規」

禪宗自初祖達摩東來，最初的三百年當中，禪僧大都依住在律院或是巖穴、樹下，並沒有建立禪刹。由於法制有限，共住時生齟齬，大家深以為苦，馬祖道一（七〇九—七八八）大師於是創立叢林，以安禪侶，由此宗門益盛，轉化無窮。

馬祖大師以「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大弘禪風，入室弟子有百丈懷海、南泉普願、大梅法常等百餘人。當中懷海禪師（七二〇—八一四）繼師之志，為了安僧隆刹，於是參照大小乘的經律，制定叢林規矩，撰寫了二卷的《百丈清規》，此為禪宗清規之濫觴。

《百丈清規》一書包括叢林的一切事務，諸如法堂、僧堂、方丈之設置，並從僧眾當中選擇賢德者擔任首座、書記、知客、監寺、維那、典座等職事，專職負責各項事務。此外，對於大眾平日的朝參、夕聚、齋粥、普請等行事，皆有規定。學眾聚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並設長連床，供坐禪偃息。而住持須為兼具道眼及德行者，居住於方丈之中，時時出法堂，上堂陞座、小參垂示，以御大眾。凡此種種都成為叢林的新例，而與律法不同，世人即稱為《百丈清規》，自此以後天下叢林皆依此規為寺院生活的儀則。

《百丈清規》之後，我國陸續有宋代宗贖作的《禪苑清規》十卷、瑞巖的無量宗壽禪師所作的《日用小清規》一卷、婺州金華的惟勉禪師所作的《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以及元代東林澤山之 咸禪師作《禪林備用清規》十卷、中峰明本禪師作《幻住庵清規》一卷、明代壽昌下第三祖天界之道盛禪師作《壽昌清規》一卷等。

百丈禪師自從建立禪院，制訂叢林清規之後，並且率眾修持，實行農禪生活，力求自給自足。直到晚年，一直耕作不已，弟子中有人不忍他年老辛苦，在屢勸無效下，遂悄悄藏起鋤頭，師因此絕食，留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

師所訂之《百丈清規》，天下叢林無不奉行，為禪宗史上劃時代之功績。宋代儒者也仿效而創立書院，元明清三朝更以書院為鄉學，充為養士之所，此皆拜師所賜。

「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由於禪林清規不涉及戒律，避開鋒頭，迂迴而進，是一種創見，也是智慧。後代佛子，不如祖師的智慧，硬是執著教條，造成文字障，甚至彼此互相批評、鬥爭，抵銷傳教的力量，實在可惜。

十、永明禪師倡導「禪淨共修」

佛教自東漢傳來中國，歷經各個朝代的演進，到了隋唐時期，由於經典的翻譯大致完備，各個學派的基本立場與思想旨趣也已確立，因此先後開宗立派，形成中國大乘八宗齊頭並進的佛教輝煌時期。

然而到了五代趙宋時期，由於佛教經歷「三武一宗」教難，元氣大傷。當中僅剩禪宗與淨土宗因為「禪以觀心、淨以念佛」，二者皆不受典籍流失的影響，而且也不一定需要有寺院殿堂作為基地，山林水邊皆可參禪，行住坐臥都能念佛，故能並立於世，並且彼此相互爭主，希望自宗成為佛教主流的地位。

在當時，禪宗的行者認為，佛性本具，無須依靠名言教相及念佛修懺，即可悟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因此譏嘲淨土宗是靠「他力」的佛教，是屬於老公公、老婆婆等人所修行的「鈍漸法門」，不似禪宗的一超直入之「頓悟法門」為高。淨土人士也對禪宗提出反擊，認為禪宗的修行者狂妄傲慢，訶佛罵祖，偏見執著，沒有宗教情操。又說禪者的修行容易走火入魔，不如淨土三根普被、廣大易行，於是有《十疑論》等著作，指斥禪宗的偏見。

正當禪淨互爭主流地位的時候，幸有永明延壽禪師（九〇四—九七五）出來調和，他倡導「禪淨共修」，不但撰著《萬善同歸集》，闡明見性成佛，亦得誦經，並且廣作萬善行門；尤其他作〈參禪念佛四料簡〉偈，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

爲人師，來世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以標明「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這種主張給予當時禪林一大啓示，後代禪師如天衣義懷、慧林宗本等，亦有此共鳴。

永明延壽禪師是中國佛教史上，首位透過宗門禪而融攝教、律，並提倡「禪淨雙修」法門者。他以禪淨融通法相、三論、華嚴、天台等各宗派教義，並主張「祖佛同詮」、「禪教一體」的思想，使得「禪淨雙修」在元、明之後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